

负责《培养精英》一书的编辑告诉记者,薛涌是一个愿意和媒体打交道的作者,虽然远在美国,但采访属于“今天采明天回”的那种,特别爽快。果不其然,记者头天去采访提纲,第二天回复便翩然而至。读及回复,痛快淋漓,宛如一位激情四射的学者在你的面前慷慨陈词,丝毫感受不到网络等虚拟设施带来的阻碍。

薛涌快速而高质的回复也解释了记者心中的一点疑惑——薛涌为什么那么高产?要知道,仅在去年,他出版了4本书《北大批判》、《仇富》、《怎样做大国》和《一岁就上常青藤》,在他的博客里,薛涌的“新年还礼”筹划除了《培养精英》,今年还将出版4本书。

薛涌毕业于国内名校北大,又获得耶鲁博士学位,现执教于美国大学,中外教育之比较是他论及最多的问题,他观察、揣摩着他者的教育,并一点一滴地向国人揭开那幅教育的画面。

薛涌：“精英”这个词太势利

□受访者：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 薛涌
□采访者：本报记者 李芸



《培养精英》,薛涌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定价:32.00元

《科学时报》:在你出版的书中,书名里有不少提到了“精英”,譬如《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一岁就上常青藤》这本书的封面上也印着“美国精英教育的不二法门”,在你的定义里,何为精英?你还出版过一本名为《草根才是主流》的书,草根指的又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高校扩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你认为该如何开展精英教育?

薛涌:所谓“美国精英教育的不二法门”等等,是出版社给我加上的,大概是想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吧。我个人不同意“不二法门”之说。毕竟培养人才有多种方法嘛。不过,“精英”一词我非常常用。用的时候心里很矛盾。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觉得有些太势利。但是,国内的读者喜欢,家长也都望子成龙,所谓“龙”其实就是精英。美国朋友访问中国回来告诉我:中国实在是“精英”满天飞。

我用这个不太喜欢的词,主要目的是出于和国内读者对话方便而已。我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培养一个有成就的人、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人。但是,这么说似乎太绕口了,还是“精英”来得干脆。一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至于“草根”,则是从美国社会中学来的。一般社会的老百姓都可以叫草根。在美国有句名言:“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其实也说的是一切权力来自草根社会。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特别需要来自基层社会的草根动力。所以我说“草根才是主流”。

高等教育扩张,要先在草根上下功夫,在提高义务教育水平的基础上进行。义务教育水平提高了,达到上学的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多了,大学生源充足,录取更有竞争性。有了竞争性,能够十里挑一甚至百里挑一,才谈得上精英教育。美国大学的成功,最大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成功,使得竞争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学竞争也就愈演愈烈。中国则本末倒置。义务教育不完备,能上大学的人口无法大幅度扩张,但大学不断扩招,形成生源有限,大学生人数持续翻倍上涨。结果,60%的考生上了大学。大学匆忙扩张又无法保证教育质量,选才不精再加上粗制滥造,形成了大学“弱智化”的倾向。

《科学时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经过温总理的引述,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你毕业于国内名校,又执教于美国大学,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薛涌:一个很大的答案是:这个问题一定要总理引述才会获得注意。这样的社会能培养得出杰出人才吗?社会要有自发的动力才行,不要靠领导号召。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十几年前还是所走读学校,最近扩张迅速,建了宿舍,引起媒体注意。于是有校友发问:扩张这么厉害,怎么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看看,人家不等总统问,不等州长问,自己就会问。这是所谓“草根”的动力。没有这种“草根”式激情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前途。

《科学时报》: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有的专家调查、总结了近年来失业率最大的几个专业,比如中文、英语等等,于是建议大学关停合并这些专业。你认为大学生的失业,是专业原因造成的吗?《培养精英》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大学选专业,人文学科的价值》,讲到了人文学科培养人才的关键作用,但在今天的中国专业与工作关系极为密切的情况下,是不是务实比务虚更重要?如果国内一位高中毕业生向你请教专业的选择,你会有什么建议?

薛涌:我在《培养精英》和《北大批判》中都比较系统地谈了这个问题。30多年前我考大学,上了中文系,家长怕我以后没有出路,强烈反对。现在看看如何呢?我就靠算文为生,在国内也属于高收入阶层了。如果我的孩子在国内,要学中文或者英文专业,我绝对会支持。如果学财会,我可能会有些失望,当然也不会干涉了。如果一个高中生问我应该选什么专业,我会说,选一个对得起自己青春的专业。什么叫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呢?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人只有一个生命,也只有一次青春。青春充满了理想、憧憬、梦幻,吸收自己心灵追求的东西最快、最充分。所以,选的专业,一定要是自己心灵追求的东西,说得

再白一点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叫对得起自己。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上。当然,人不得不干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那应该是在大学以后。

所以,面临眼花缭乱的专业,你应该问问自己:哪个专业更触动你的心灵?更让你激情万丈?年轻人学习缺乏激情,很难学好,那不是快乐,而是受罪。如果你面对大学的专业,一个也不想学,那么你实在应该想想是否需要上大学。你看人家韩寒多潇洒,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你选择了自己最有激情的东西后,就义无反顾地学下去,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一般而言,学习自己为之疯狂的专业,最容易有一流表现。有了一流表现,日子就不用太愁了。我上大学时,想法就这么简单。当时父母说:靠笔杆子,只有达到一流才能过日子,那太难了。我则说:为什么我不能到一流呢?年轻人无此志气,实在枉活一世。

《科学时报》:有人认为中国教育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学生普遍用功好学、基础知识牢固等,过多强调借鉴外国的经验,有可能丧失自己的长处,你的看法如何?

薛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一个不能学习外来经验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谓牢固的基础知识,许多过时了怎么办?有这种基础知识,没有基础技能怎么办?人类进化,核心就在于应变二字。学生一定要时时刻刻认识到,自己现在学的东西随时可能过时。什么都靠不住。但是,好的大学教育能给你这样的信心:你永远可以根据环境的新挑战学会新东西。美国的大学,特别注重贯彻这种精神。这也是我书中论述的重点。

伴随彻夜的鞭炮声和觥筹交错的年夜饭,虎年隆重地来到人间。“虎年大吉”、“虎虎生威”这一类吉祥的祝辞,在亿万人嘴里传递着,使用频率创下新高。中国人对老虎似乎情有独钟,老虎造型威严、勇猛而且美丽的形象,在中国古老的原始艺术和行为观念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勇猛善战的军人称为虎将,健康的孩子命名为虎娃,调兵遣将的凭证称为虎符……直到今天,以老虎为原型的工艺品广受青睐,就连许多身怀六甲的准妈妈也要求提前剖腹产,为的是生下一个可爱的“虎头虎脑”的“虎宝宝”。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对于老虎的感情是相当复杂、自相矛盾的,如果仅仅从春节期间人们对老虎的热情来判断,连老虎本身恐怕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这是假象,从老虎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及老虎的遭遇,结论可能恰恰相反。

我小的时候,老虎还很多,那当然是遥远的往事了。那时我家住在庐山脚下,时常听说山上有野生的老虎出没,老虎闯入农家偷袭家畜的事时有发生,也有猎人围捕老虎的消息。后来更多的则是大规模的“打虎运动”,还因而产生了很多打虎英雄。中国当年捕杀了多少老虎我不清楚,但是除了动物园里的老虎之外,老虎这个物种在中国濒于灭绝,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近日读英国学者苏茜·格林撰写的《虎》,书中写到,老虎虽然以其雄伟的形象被人们喻为森林之王,成为帝王、国家和军事力量的象征,但是这种地球上最强大的食肉动物却逃不了濒临灭绝的命运,这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这一现象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降龙伏虎”以抬升自身的地位,是人类历史上的思维逻辑。既然老虎是百兽之王,那么能够杀死老虎的人必定是异于常人的英雄。据史料记载,清代帝王在木兰围场猎杀老虎135只、乾隆皇帝弘历猎杀老虎

□金涛

虎年伊始,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虎》,作者苏茜·格林指出:“当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虎被大量猎杀,它们的安身之所也遭到严重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于历经屠戮处在灭绝的老虎却是又一次灾难的开端。“殖民时代虽然大量猎虎,但狩猎者毕竟仅限于统治阶层。曾经专属于贵族的特权一旦落入人民之手,变成了民主权利,虎的灭顶之灾也降临了。业余猎手、狩猎旅行社(他们把猎虎做成了假期旅游套餐)、专职偷猎者,甚至农民都参与其中。这还不够,再加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猎虎活动,还要布网、挖陷阱、设捕兽夹、烧毁森林。1600年老虎的数量尚且远远超过100000只,1900年减到50000只,及至1970年更下降到不足2500只。”在孟加拉

潘家园·书话

身恐怕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这是假象,从老虎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及老虎的遭遇,结论可能恰恰相反。我小的时候,老虎还很多,那当然是遥远的往事了。那时我家住在庐山脚下,时常听说山上有野生的老虎出没,老虎闯入农家偷袭家畜的事时有发生,也有猎人围捕老虎的消息。后来更多的则是大规模的“打虎运动”,还因而产生了很多打虎英雄。中国当年捕杀了多少老虎我不清楚,但是除了动物园里的老虎之外,老虎这个物种在中国濒于灭绝,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近日读英国学者苏茜·格林撰写的《虎》,书中写到,老虎虽然以其雄伟的形象被人们喻为森林之王,成为帝王、国家和军事力量的象征,但是这种地球上最强大的食肉动物却逃不了濒临灭绝的命运,这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这一现象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降龙伏虎”以抬升自身的地位,是人类历史上的思维逻辑。既然老虎是百兽之王,那么能够杀死老虎的人必定是异于常人的英雄。据史料记载,清代帝王在木兰围场猎杀老虎135只、乾隆皇帝弘历猎杀老虎

58只(见陈冰辛著《木兰围场风情史话》,中国华侨出版社)。

《虎》的作者苏茜·格林指出:“当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虎被大量猎杀,它们的安身之所也遭到严重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于历经屠戮处在灭绝的老虎却是又一次灾难的开端。“殖民时代虽然大量猎虎,但狩猎者毕竟仅限于统治阶层。曾经专属于贵族的特权一旦落入人民之手,变成了民主权利,虎的灭顶之灾也降临了。业余猎手、狩猎旅行社(他们把猎虎做成了假期旅游套餐)、专职偷猎者,甚至农民都参与其中。这还不够,再加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猎虎活动,还要布网、挖陷阱、设捕兽夹、烧毁森林。1600年老虎的数量尚且远远超过100000只,1900年减到50000只,及至1970年更下降到不足2500只。”在孟加拉

虎年的遐想

地区,虎根本毫无生存机会,它们随时会遭捕杀,不管是在睡眠、交配、进食还是捕食,人们甚至从温度尚存的雌虎腹中取出虎胎,好虚报猎获数字。虎赖以生存的森林被毁,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小片林地,令它们无处可逃。1800年左右,虎对人类的反应完全被恐惧所支配,虎每天都提心吊胆。森林日夜受到侵扰加上无休止的折磨,令它变得像战乱中的人那样发抖。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据动物学家谭邦杰编著的《虎》(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12月)透露:1959年2月林业部颁布的文件《关于积极开展狩猎事业的指示》,一方面强调对东北虎的保护,同时又提出“应鼓励猎民以根除四害的精神,大力捕杀对人畜和农林作物有害的鸟兽,如狼、虎、豹、熊、野猪等”。苏茜·格林也指出:“在中国,有一个时期,虎被贴上了‘害人’的标签,鼓励灭虎。这不仅给虎敲响了丧钟,也将中国自古尊为灵兽的形象、阴身的化身——白虎——彻底打碎。”

作者认为,由于人类的凶残猎杀,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大自然提供的食物,致使难以生存的虎变得野性大发,开始袭击人类,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给老虎带来灾难的另一个貌似科学的现象,是长期以来视老虎骨头和生殖器为灵丹妙药,中国流行的以虎骨泡酒作为一剂治疗跌打损伤和去风湿的中药,曾经是很普遍的。我无法判断其药用价值的可靠性,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导致对老虎的猎杀,以及时至今日偷猎行为仍有发生的动力。“在亚洲,人们把虎与性、力量相关联,这对虎来说则非常不幸——几百甚至几千年来,虎鞭、虎板油和其他器官一直是公认的壮阳药。”作者指出,“这些需求早已给生活在中国的虎类种群敲响了丧钟,把泰国的种群数量降到不足150只,并预示着虎也有可能在中国消失。”

人类仍在不断地扩大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间,这个趋势恐怕是挡不住也改变不了的。这也意味着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虎们

《虎》, [英] 苏茜·格林著, 乔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3月出版, 定价: 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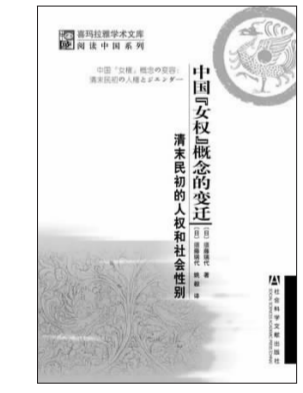


《虎》, [英] 苏茜·格林著, 乔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3月出版, 定价: 25.00元

仍然面临生存空间挤压的威胁。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如不采取紧急措施,老虎向现代化的灭绝是迟早的事。相关的法律和国际公约已经颁布,保护措施也在落实,但愿虎们在人类划定的保护区生存繁衍,绵延下去不致灭绝,这也是人类痛改前非的一个最大的成果。

千万不要虎头蛇尾哟! 这是虎年我的企望。

编辑荐书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 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 [日] 须藤瑞代著, 姚毅译,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年2月出版, 定价: 39.00元

作者对“女权”概念的引入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值得一提的是, 该考察不是从纯学术的层面考察其变迁, 而是将其与彼时的国情和国势相结合, 描述女性争取权利的过程和知识分子与爱国人士对“女权”和理想女性的理解。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美] 杰克·威泽弗德著, 温海清、姚建译, 重庆出版社 2009年11月出版, 定价: 35.00元

成吉思汗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 他的军队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 在他的推动和刺激下, 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

值得重视的理论：“文明的冲突”

□李成

多年前,我就有了一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不过我并没有去读它,因为那时候,正值美国“9·11”事件之后,“文明的冲突”论正甚嚣尘上,我就是不看其“始作俑者”的原著,从各种途径也明白一点这一言论的意思。这次,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修订本,我又拿到一本新书,比较细地读了一遍,觉得还是很有收获。

塞缪尔·亨廷顿的这部名著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文明的冲突”论。其次,就是它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全球各个地区的国际关系及其历史与走向,二者紧密结合,互相支撑,形成一个起码表面看来能够自圆其说、比较稳固的理论框架,足以观照当今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引领人预测世界将来的局势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应该说,看完此书,还是让人对作者产生敬佩的心情,他不愧为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他对天下大势的把握是清晰的、洞察是比较深刻的,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能一一剖析,大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之势,显示出一个学者的学识积累与良好的专业素质。但是,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文明的冲突”这一理论之上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理论,作者才能执筒驭繁,将看似没有头绪的各种纷争理出一个规律来,这正是亨廷顿的过人之处。甚至可以说,亨廷顿全球性的名声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上的。

“文明的冲突”观点即便不是亨氏的独得之秘,也是经过亨氏反复琢磨。自他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就在国际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和普遍争论,表明这一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关注,同时也表明这一理论有一定的“真理性”,如果它不是揭破了

一定的世界之“秘”,如果它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么它肯定不值一哂,遑论争论呢?因此,本书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当今世界的“肯綮”即要害。

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作者认为,在冷战时代,世界局势基本上是形成互相对抗的以美国、苏联为核心的两大阵营;而冷战消失后,国际舞台上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是以不同文明间的斗争形式展开。哪些文明呢?作者指出现在世界上主要存在七种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非洲文明。为什么说世界当前和未来的冲突将以文明的冲突为主呢?这是亨廷顿在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主要论述的问题,他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部落,“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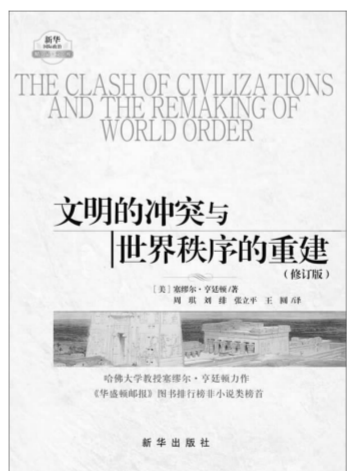
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同时,亨廷顿还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角度分析了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

化进程的强烈要求。亨廷顿甚至断言:由于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断层线冲突是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将断层线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暂时性地休止断层线的冲突。

亨廷顿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他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事实: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它们前领土爆发战争(世界上一些国家纷纷支持其亲缘国家);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国内进行着关于认同的斗争;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伊斯兰教国家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问题上抑制西方的压力;伊斯兰教国家和儒教国家努力争取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东亚在发展武器上进行竞争。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之所以得出“文明的冲突”论,其核心指向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伊斯兰势力的扩张及由此导致的他对西方势力衰落的担忧和不安。他在书中多次分析了伊斯兰文明的特点与动向: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邻国的平衡关系。

以上就是本书的框架与一些要点。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说,它的确部分的“真理性”,不然,何以解释作者所列举的一些主要事实呢?但是,它并非具有全部的真理性。“文明的冲突”存在不存在呢?我们说:存在。一种文明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维护生活在这种文明之下的人们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本)》,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 周琪译, 新华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 定价: 39.80元

几大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互相竞争的斗争之中(其中当然有融合),文明之间的冲突非始自今日,也并非始于今,亨廷顿在书中也不一再提及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这一事实吗?应当说:当今世界上的几个冲突焦点都是历史的产物,这样一来,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当今世界的“新”特点不免就似是而非。世界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变动与发展之中,即使在某一时期,“文明的冲突”这一特点表现得明显一点,也未必就能说明,它会一直强化下去以至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被一再证明是错误的,也是一种杞人忧天的理论。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世界必然仍是多元竞争,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吸收与融合,同时也只有这样,世界才是一个有生机的、多彩的世界。世界上的震荡总是免不了,但不可能始终动荡不安。得出以上这样的结论,是同样基于历史经验的提醒,同时也基于人类理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可靠性,人对安全的追求

是永恒的,而对安全的追求并非都以毁灭他人自身为代价;另外还有人自身力量的有限(亨氏在书中也提及冲突中的人民对冲突的疲倦)都决定了“冲突”只会适可而止,各种冲突力量总会找到新的均衡,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特点。谓予不信,我们可以看看,自亨氏的言论问世以来的十多年,世界局势并没有沿“文明的冲突”这一条线性到哪里,甚至也没有证实亨廷顿在书中对几种文明发展走向的预测,这些都表明亨氏理论的有限性。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因此就对亨氏的理论嗤之以鼻呢?我们说那倒未必。除了亨氏理论有部分的真理性之外,它还以此为我们提供了观照世界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它还起到了“揭破‘文明的冲突’这一带恶兆式的预言,从而避免之”的作用。应当说,这就是我们应当重视亨氏这一理论的主要地方。

当然,我们还应当追溯一下亨氏理论出笼的“心理根源”,也就是亨氏写作本书的动机与出发点。其实这在书中已有所透露,那就是渗透在本书字里行间的作者的西方立场。作为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尼尔战略研究的主任,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亨廷顿的考量都是先从西方乃至是美国

的现实状况与需求出发。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他对世界局势中的力量消涨中西方(美国为代表)力量的相对衰落表示忧虑;尤其是对美国人口中欧裔白人的数量与非裔裔移民(包括拉美裔人、黑人和亚裔人)数量的比值在下降这一事实表示恐惧(参阅本书附录李慎之文《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因此,他认为:“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他一

再追问:我们是谁?似乎一种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已经日益逼近美国,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亨氏的理论还有一个潜在的支撑也值得关注和讨论,那就是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普世文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强化了对其自身原有文化的认同,这些观点同样只具备片面的真理性。我们说,现代化固然不等于西方化,但非西方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还是有其共性的,各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又发展共性的,或许更有利于国际关系中的求同存异,互助合作,这未必不是人类之福。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重申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当更有意义,因为实践这一理念,未必不是解决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有效途径。相反,我们反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理,而对之以打压和制约——而这恐怕也是亨廷顿理论最成问题的地方。人类的历史虽然比较漫长,但人类文明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如果过早地断言人类不能形成普世文明(所谓大同),未免有些武断。

总之,亨廷顿的这部著作是包含着诸多真理与谬误的一部内容很丰富的书,它既给予我们观照世界的一个视角,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考空间。因此,它甫一问世就聚讼纷纭,“9·11”之后更急剧升温,持续高居《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非小说类榜首,至今仍给广大的读者带来阅读兴趣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次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订证了相当一部分误译,使译文更准确、更通顺,也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它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国读者的一部国际关系经典读本,也就可以预期。